

第四章 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6.3~1941.9)

一、恢复和发展神府苏区（在神府特委）

(1936.3月~1939.3)

神府革命根据地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孤悬于陕西最北部，与山西、内蒙交界。以神木为中心，包括府谷、佳县和榆林的部份地区。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4万。

在西北地区，神府根据地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她侧背方向直接威胁陕北军阀井岳秀的统治中心榆林和山西军阀闫锡山在晋西北的河防地带，因此长期受敌人“围剿”。1934年9月和1935年初敌人发动两次大规模“围剿”；同时受“左”倾机会主义“肃反”的破坏，使苏区的23个区被敌人占去18个，各级党组织大部份遭到破坏，3800多名党团员剩下400多名，500多名干部剩下100多名。^①神府苏区红军部队大部分被打散，大批红军战士被迫掩埋武器，分散回家活动。敌人到处捕杀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加上重兵封锁，神府苏区与上级联系中断，根据地陷入困境。

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陕甘宁根据地的危机克服后，毛泽东立即着手把陕甘根据地建成争取北上抗日的出发地。中央决定成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神府、关中、三边三个特委，直属中央领导。

中央对神府苏区严重局势十分关注。1935年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神府苏区的问题。会上，毛泽东指出：“神府虽不大，但这个地区很重要，是抗日前哨！”他指示去神府的同志“一定要把党员动员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动员一切力量建立统一战线；要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还要遇到困难，不要被困难所吓倒，坚持斗争，坚持下去就是胜利。”^②

年底，中央派杨和亭、张汉武、张江全等同志奔赴神府苏区开展工作。

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以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开展。

^①
^②

为在黄河一带建立可靠的后方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今后的战略行动，加快恢复神府苏区，加强神府苏区的领导力量，决定派张秀山等人去神府工作，周恩来副主席亲自给张秀山部署了工作任务。

1936年3月初，张秀山、刘明山、邓万祥、黄正明、白兴元等人在米西游击队护送下，穿过千里敌占区，来到了神府苏区。开始时，张秀山任中共神府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神府特委在毛家洼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秀山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

王兆相说：“张秀山同志在会上给大家正式传达了1935年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他听过毛主席在大会上的报告，还带来了文件。把当时毛主席就中国各阶级对抗战的态度和我党我军当前的任务和策略的分析与论述，给大家讲的清清楚楚。在长期被敌人封锁下，囿于神木这块小天地之中的同志们听了，觉得既新鲜又开窍。”^① 大家一致表示党中央要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神府特委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纠正了“左”倾“肃反”中的错误；团结了一切反日力量。特别是在对待反“围剿”斗争中，被遣送回家的自首党员的问题上，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受到根据地军民的一致拥护。“对新开辟的地区，强调先建立抗日人民委员会，由共产党的代表和当地的积极分子、群众领袖担任各部门的工作，领导和处理群众的一切问题。”这对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加快神府苏区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为了尽快打通陕北与神府苏区，建立奔赴抗日前线的通道。3月，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由吴堡北上，一路征战进入神府苏区。先战桃柳沟歼敌一个排，又打杨家
歼敌两个连，俘虏敌军一个副管长。有力的支援了神府的斗争。

张秀山听到刘志丹带部队来到神府，就急匆匆骑马赶来。自从几个月前，在“肃反”时他们被党中央和毛主席解救，刘志丹带部队打仗，张秀山到神府就一直没有见面。见了面，两人亲切地拉着手一起向山岭上走去……

张秀山急切地询问了刘志丹最近的状况，以及他身边的原26军战友的情况。刘志丹关切地问张秀山家人被迫害的经过和后方习仲勋等战友工作安排怎样？

^①

当他们谈到战友牺牲和亲人被害的噩耗，两人都默默地留下了热泪。他们望着神府远方的尚没有解冻的山川，迎着乍暖还寒的风沙，相互鼓励着，跟着党中央干革命，他们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会将陕北肃反问题处理好。

在陈家坪，神府特委召开了欢迎红二十八军大会。刘志丹、宋任穷和张秀山等人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周围村庄的父老乡亲牵着猪羊，拿着煮好的鸡蛋和烙好的白面饼前来慰问子弟兵。

为了支援二十八军强渡黄河与十五军团会合抗日，特委派王兆相担任二十八军临时参谋，王道三组织。神府苏区军民奋战7天7夜，赶造出所需渡船。在神府红三团和游击队配合下，红二十八军于山坡村突破黄河天险，胜利地攻占了罗峪口。接着又占领黑峪口。神府苏区随后在那里建立了临时革命政权，并且扩大了红军和游击队。

刘志丹率二十八军帮助神府打开局面，在特委领导下，苏区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初步扭转了被动形势。

不久，中央决定张秀山担任神府红军指挥部政委。

神府根据地除神木县的少数村庄外，其余都是我军与敌军插花相间进行艰苦复杂斗争的游击区，尤其府谷北区的根据地自1935年春被敌人占领后，至今尚未恢复。

神府特委决定改变这种状况。王兆相说：“5月初的一天，特委组织部长张秀山同志派人通知我去阎家堡找他。他向我传达了神府特委关于把三支队改编为红四团的决定。任命我为团长，贺伟同志为政委，下编两个连。任务是到府谷地区支持地方工作，相机歼灭小股敌人，并准备在适当时机进入府谷地区，恢复那里的根据地。我们随即带领红四团来到府谷县的郝家塔、武家庄一带活动。

5月中旬，特委命令红四团到沙峁镇接受。张秀山同志向我说：委决定红四团和红三团配合行动，集中力量打击敌人。^①

此期间，神府红军有了很大发展，两个红军团、三个独立营，还有几支游击队都在活动。为了便于统一指挥，特委召开了两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总指挥部。王兆相任指挥，张秀山任政委，刘明山任副指挥。

“张秀山同志任政委后，在他的指导下部队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焕然一新，

^①

发生了很大变化。”^① 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神府苏区的神木是张秀山的家乡。

“张秀山带着红军回来了！”长期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者和敌人迫害的身体虚弱、脸色苍白的二弟张鸿耀，听到这个消息，从炕上一跃而起，同母亲一起向门外跑去。张秀山骑着战马，头戴红军八角帽，身着灰色军装，腰挎十响驳壳枪，威风凛凛地带领红军骑兵大队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二弟跑了过去，紧紧地抱住下马来的大哥，悲喜交佳。老母亲望着两个一样高大英俊的儿子流下了热泪。

家乡的天空一下子都亮了。

利用部队休息时间，老母亲高高兴兴地带着两个儿子了，骑着马去东南 20 余里的马家沟，看望了张秀山的舅舅。因为舅舅家的表弟被国民党军队杀害，舅母被敌人枪击伤重而死，舅舅和亲属们看见了秀山，就象看见了红军胜利希望，老人把两个外甥紧紧地拥在怀里，高兴得又说又笑，然而想起被杀害的亲人，老人又哽咽不止……

张秀山从分别 7 年的母亲那里得知，自己的父亲、大伯、堂兄，在 1935 年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杀害。当家人向他哭诉着：父亲为了支援红军倾尽家产，见到红军就打听儿子的消息，每次都拿出家中最好的东西招待红军，为红军购买布匹和手电筒，捐赠部队急需的衣物、粮食和大烟土、现款，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对老人很好，土地革命时，家里按红军家属的待遇，保留了土地。他们说：“你儿子革命，你也拥护红军，我们就是一家人了。”^②

1935 年 7 月 11 日（农历 6 月 30 日），张秀山的父亲张如德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抓了起来。诬陷他与白匪有勾结，同情被左倾肃反杀害的亲人。

二弟是读书人，本来就性格内向，不愿意说话。拷打父亲的时候，二弟也被捆绑在旁边，他亲眼目睹了“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毒刑拷打自己的父亲的情景。他想不通，他实在是想不通，红军怎么会这样？他们与秀山大哥当的红军不一样吗？二弟因此气愤和忧郁致病，因为无钱医治，病已经很重了。

同志们和亲友劝张秀山把二弟带到红军医院救治，张秀山坚决不同意。他流着眼泪对家人说：“我爱二弟，可红军的药和钱，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不能用。”一年后，二弟去世。

^①
^②

当地的反动派幸灾乐祸地叫嚣：这就是张秀山当红军的好处，他们家参加红军的最多（被张秀山带出的堂表兄弟共有8人）。

对此，亲属和乡亲们都很不理解，他们盼着张秀山回来，为死去的亲人报仇，为自己的弟弟治病，可张秀山却什么也没有办成。张秀山对亲属和乡亲们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再犯他们那样的错误。我也不能为自己的家人谋私利。”

张秀山十分怀念自己的父亲，在一次部队行军路过家乡的途中，一个人骑着马来村边山崖上父亲的坟前，默默地倾诉心中对老人家的无限哀思。母亲得知张秀山去了父亲坟地，就在山崖下路旁的大树下等他。母子相见。张秀山深情地拉着母亲的手，反复向母亲解释了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报仇”的原因，他说“很多革命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我也负过重伤，但没有死。为什么？是因为战友们舍出生命，冒死从敌人的枪口下把我抢救下来；是老百姓和游击队抬着我躲过敌人一次又一次搜捕；又是他们为我请来了医生，送西安养好伤，要不我早就没命了。革命已经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在革命队伍里，我只有爱护战友，战友才能在危险时候，把我从火线上抢险救下来。同样，我们只有善待老百姓，对他们好，老百姓才能拥护我们，革命才能成功。现在，这里的同志错杀了父亲，犯了错误，但他们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人，革命还需要他们。再说，‘左’倾机会主义‘肃反’，错杀的何止成百上千名革命同志？我是红军政委，已经知道他们错了，又怎能错上加错，自相残杀，让敌人高兴呢？”望着秀山流下的泪水，申明大义的母亲含着眼泪点头同意了儿子的做法。

张秀山从革命大局出发，不计个人恩怨，他派人把那些躲藏起来的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党员找回来，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人死了是不能再复活的，你们要记取教训。不要背包袱，好好干工作，注意掌握党的政策”。对待这些党员，张秀山不仅没报私仇，有的人后来还得到了重用和提拔，有的当上了山西塑县县长和县大队长，有的担任了佳芦县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有的担任了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甚至担任了更高的职务。为了革命，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可以把杀父之仇放弃到一旁，张秀山连一句责骂的话都没有说过，而且彼此还能成为并肩战斗和生死与共的战友。就是在敌人围剿时背叛了革命，同时也参与杀害父亲的人，张秀山也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没有打击报复。

张秀山对这件事的处理，对当时的神府苏区震动很大，人们一提起张秀山无

不敬佩地竖起大拇指说：“张秀山？嘿！真正的共产党！”

这次回来，忠厚的张秀山还把等了他多年、父母包办的妻子白协英，多次接到自己身边。张鸿志说：“大嫂决定要跟大哥到苏区去。因为大嫂害怕孤独，就把我也带去了。那年我8岁，记得大嫂骑着一头毛驴，我与大哥跟着她。大哥怕我走不动，就让我走一阵，他背我一阵，最后到达了红军驻地温家川。”

张秀山为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叫“一兵”，寓于红军中又来了一名士兵。后来，由于红军战斗频繁，没见过世面，又缠了小脚的白协英很不适应枪林弹雨的部队生活。一次红军驻地遭到敌人包围。部队突围时，她从马上摔下受到惊吓，在她自己的要求下，张秀山把她送回老家。从此，她不愿意再出来与张秀山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

张秀山的堂嫂——张鸿恩的妻子说：“那年春节，秀山带着警卫员，从红军驻地骑着马跑了3天，回到家里，协英说什么也不再去红军那里，她害怕打仗。秀山也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自己走了。”

张秀山临行时，看到堂嫂为了支持堂兄参加红军干革命，一个人独自带着3个年幼孩子艰难度日，慈爱地用大手抚摸着老大6岁宪国的头，对堂嫂说：“国民党黑暗腐朽，现在只有闹革命，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他读书才行，将来好为国家效力，因为他是红军的后代。”

以后，张秀山与白协英离婚，白协英改嫁他人。但是，当生活困难的白协英患上重病时，张秀山仍然捎去钱接济她，使她转危为安。

6月，西北军委决定将陕北苏区划为5个作战分区。神府为第一作战分区，任命张秀山为司令员，杨和亭为政委。

经中央批准，8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神府）红军独立第一师成立。师长王兆相，政委张秀山，秘书长王恩惠，参谋长李治州，政治部主任王国昌，供给部部长王海山。另编警卫、侦察、骑兵3个连。独立师下属2个团，即红3团改为第1团，团长刘明山、政委邓万祥；红4团改为第2团，团长贾兰枝、政委贺伟。每团4个连，每连100多人，共1000多人枪，机枪20多挺。以后，又成立了第3团（后改为骑兵团），团长刘崇德、政委许法善。

1936年8月1日，神府苏区佳芦县花石崖村，晴空万里，红旗飘扬，红绿标语贴满墙头，四周街巷、山坡人潮涌动。中共神府特委在这里召开庆祝红军独立

师成立大会。会场设在村里河滩上一座古庙前，新搭的主席台的横幅上醒目的写着：“庆祝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独立第一师成立大会”。

会上独立师向全国发出宣言，通电全国，电文是：

“全国各武装部队、全国人民公鉴：

在神、府、佳几年来的游击战争中，创造了神府抗日根据地，扩大和锻炼了红军，最近在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与神府特委的领导之下，在各地人民的拥护声中，正式成立了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处于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妄想并吞全中国，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红军抗日去路，进攻陕甘抗日根据地与主力红军转移阵地的形势之下，本师的成立，在抗日讨逆的战线中是有伟大意义的。

当本师成立的今天，特向全国人民与一切武装部队通电。我们站在抗日、讨伐卖国贼的立场上，联合全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与一切武装部队，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拥护粤桂联军抗日讨蒋武装，坚决反对卖国贼部队进攻。誓死保卫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与日直接作战。

谨此奉闻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独立一师

师长 王兆祥

政委 张秀山

八月一日”^①

当天晚上，张秀山给全师官兵作了报告。

王兆相说：“张秀山政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分析了形势和保卫苏区的任务，具体地指明了战胜敌人的有力条件。他说，我们有神府地区对敌作战的经验，也有红二十六军对敌作战的经验，特别是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神府地区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他作了形象的比喻，说神府群众就是革命的大海，独立师就是大海中的一条鱼。鱼要靠水才能活命，才能游来游去，我们红军只有依靠群众

才能生存，才有行动自由。他还要求地方干部多为部队筹集粮食，不要用粮食烧酒。敌人进去的地方，要实行坚壁清野，不能让敌人搞到粮食。秀山同志的报告入情入理，很实际，很有说服力，干部们听了受到很大鼓舞。

独立师的成立，使神府地区的武装力量不仅在组织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在政治素质上也发生了很大的飞跃。首先是部队的政治工作加强了。由红二十八军、红十五军团转来神府的一些伤病员同志，带来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特别是担任师政委的张秀山同志，很重视部队的政治教育。

那时，红军中存在的思想问题，比较明显的是农民意识、地方观念；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生活散漫，游击习气。部队的政治教育就是联系这些问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进行党的统一战线教育，把保卫神府苏区和土地革命成果，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保卫中华民族利益紧紧联系起来。批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恐日病’，树立依靠全国人民抗战一定胜利的必胜信心；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克服游击习气；进行党的知识教育，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集训连队指导员，总结如何加强党支部建设，开展党支部工作的经验；总结加强军民关系，进行遵纪守法教育的经验。

政委张秀山还起草了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对在各种情况下进行政治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如进攻战、伏击战前的政治工作，行军宿营中的政治工作，打了胜仗的政治工作，打了败仗时的政治工作，使部队政治觉悟得到提高。”^①

由于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肃反”的余毒在神府苏区还没有得到彻底根除，一些人打着纯洁革命队伍的旗号，大搞“逼供信”，使广大的干部、战士深受其害。张秀山、王兆相等独立师的领导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这种作法。

一次，张秀山路过特委保卫局时，发现他们抓捕了一名他认识的红军干部，他马上出面加以制止，说：“我熟悉他的情况，他是一个好同志。”就这样，这位红军干部获救了。

李正亭同志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张秀山同志，是在神府苏区的陈家坪，那时正是反围剿战斗的关键时刻，我们神府独立师在这里召开了会师大会。张秀山政委在大会上发表动员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师指战员的斗志。我当时很年轻，

^①

只有17岁，是一营一连连长兼指导员，我们一连有70多人。这里，我们这里正根据特委保卫局的指示，开展‘肃反’运动。一天，我接到上级命令，指名要一连的4名战士到后方培训。实际上，他们是被当作‘AB’团抓了起来，而我却被蒙在鼓里，在‘肃反’人员的严刑拷打下，有的战士屈打成招，他们4个人很快就被拉到外面的草坪上被砍头了。‘肃反’事态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我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可我却一无所知。张秀山政委得知这个情况后，在营教导员刘全胜的陪同下，立即骑马赶到了我们连的驻地。秀山一进门就问道：‘谁是一连指导员？’我马上回答道：‘我是’。接着，他问：‘你们连的这四名战士到底表现怎么样？要说实话！’我说：‘他们政治坚定，作战勇敢，表现很好。’张秀山政委故意大声地说道：‘你这个小鬼，不要胡说，脑袋怎么掉的，你都不知道。’他说完转身就走了。后来，刘全胜告诉我说：‘张政委仔细询问了你的情况，认为你成分好，作战勇敢，肯定不是‘AB’团，否则你的脑袋就掉了。’秀山不知道解救了多少像我这样的红军干部和战士。他对部队严格要求和对战士体贴入微的工作作风，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①

有一次，独立师的两名战士被神府特委保卫局当作反革命分子抓去审讯。没有多久，经过他们严刑拷打逼供，说这两个人供出了独立师有20多名反革命分子，他们让独立师把这些人立即押送到特委保卫局。根据平时对这些同志的了解，经过周密的调查，张秀山意识到，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他把保卫局开来的名单交给王兆相同志看，说：“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经过我们调查证明，他们都是我党品质优秀的英勇善战的好同志。我看名单上的人不仅不能押送到特委保卫局去，而且要反对他们这种严刑拷打逼供的做法，再不能搞左倾‘肃反’了，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每一位领导同志的注意。”

看到名单上都是工作勤勤恳恳和作战英勇顽强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王兆相气愤地说：“这些人都是好同志，说他们是反革命，简直是胡说八道！国民党悬重赏要你我的人头，咱们部队里要是真有坏人，那么把你我干掉就能发一笔大财，可我们不是好好的吗？”^②

经过独立师党委研究决定，拒绝了特委保卫局的押送要求。为了稳定部队，吸取经验教训，师领导决定加强部队保卫部门的领导工作，要求他们注重调查、

^①
^②

注重事实，不能轻信口供，不能搞逼供信。张秀山对左倾‘肃反’造成的人人自危、军民心涣散、危害革命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师干部会议上提出：不经师党委批准不准乱抓人、杀人，否则，谁杀人谁负责。这个政策制定后，军心稳定了。对苏区和红军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张秀山、王兆相的领导下，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思想教育、军事教育和战术技术训练，整体作战素质有了显著提高。独立师的其它各面工作也得到了加强和改善，部队呈现新的面貌。全师官兵平等，团结互助，作战英勇，纪律严明，热爱贫苦百姓，很快就成了无数青少年向往的地方。他们纷纷放下锄头，扔掉讨饭碗，跟着部队要参加红军。张秀山根据过去在红二十六军组织少年先锋队的经验，把这些青少年集中起来经过政治和军事集训，编入战斗部队，经过实战锻炼，他们很快就变为政治觉悟、组织纪律性强的红军战士。对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独立师成立后，张秀山提出：向北进攻的战略。既要解决部队发展壮大所需的给养问题，同时恢复和发展府谷根据地。因为是第一次带领大部队到敌战区作战，王兆相思想有压力。张秀山鼓励他说，“不要紧，放大胆，闯一闯就有经验了。”他们共同研究了作战方案和这次军事行动中应该注意掌握的政策，以及宣传等方面的问题。

经过师党委的战前动员和充分准备，红军独立师在侦察清楚敌军部署后，以突然动作，一夜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袭击了孤山、吕家岩、建安堡等地的敌人。接着，红军独立师又在栏杆堡附件击溃了敌军两个连。张秀山在吕家岩战斗中右臂负伤，但仍指挥部队消灭了木瓜、清水的民团、救出了被抓群众，补充了部分军需。

1936年8月，在准备攻打哈拉寨时，正巧寨里在举行庙会，张秀山与王兆相商定，派一部分红军战士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打进哈拉寨，当红军先头部队身着国民党军队的军装开进哈拉寨时，地方反动民团恭恭敬敬地把他们请到庙会的戏台前，让老总们——红军战士坐在那里看晋北梆子。一段戏没有唱完，后续的红军大部队就发起了攻击。红军里应外合，敌人乱做一团顷刻瓦解。哈拉寨首战告捷。“缴获步枪17枝，短枪3把，子弹及用品甚多。没收汉奸、卖国贼大洋两千余元，布匹两千余尺。这一胜利，扩大与巩固了府谷苏区，推广了抗日红军的声势

于晋绥边境。”

独立师在哈拉寨宣传党的政策，严厉打击了恶霸地主，没收了国民党反动民团财产，支持和鼓励正常的商业往来，救济当地劳苦大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不幸的是，独立师在三天后撤出哈拉寨的时候，遭遇到敌人的拦截。在战斗中，一团政委邓万祥、一连指导员张宗仁壮烈牺牲。战友们很悲痛。

由于这次行动中红军缴获的粮食有限，没有彻底解决大部队的吃饭困难问题，很多战士因缺粮生病浮肿。为了解决面临的困难，张秀山、王兆相带领部队出征外地去打土豪，剿敌收粮，从而保证了冬季红军的粮食供给。

独立师向北作战战略胜利实现。

独立师的发展与胜利对敌人震动很大。蒋介石的中央特派员和陕西、山西绥远的剿共部队共商“围剿”之事。1936年9月至11月间，敌人对神府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敌人以晋军七十二师陈长捷部四个团为主力，八十六师高双成部三个团和一个骑兵营及一些地方民团相配合，总计一万兵力。敌军这次“围剿”，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每天前进占领一、两个村庄，修筑防御工事。团与团之间联系紧密，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密集向根据地推进。

10月1日，神府特委在阎家山召开会议，张秀山代表特委作了反“围剿”报告。他对敌情和我军主攻方向作了全面分析。他说：晋军与榆林的敌八十六师不一样，八十六师是地头蛇，队伍中多是地痞流氓和土匪，熟悉苏区情况，作战凶狠刁顽。而晋军是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晋军团配有迫击炮连，营配有重机枪连，班都有轻机枪，士兵武器装备精良，子弹、手榴弹样样充足，他们善长打正规的阵地战。但是，晋军的弱点也很突出，他们不熟悉地形，在兵力没展开之前，攻共不备，猛打穷追或设伏围歼，便于我军开展游击战，可自由进退，使敌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们针对晋军特点，开展好战前练兵，我们就一定会取胜。他提出了“向南作战，先打晋军”的战略方针，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会上，张秀山部署以独立师为主力打击外线敌人，独立营和游击队在内线各自为战，伺机消灭小股敌人、破坏敌交通运输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困滞敌人。会后，特委责成张秀山代写了中共神府特委关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神府独立师在贺家川召开了誓师大会。针对晋军的特点，红军独立师立即展开战前练兵。

10月中旬，敌军深入苏区展开残酷“围剿”。敌人胃口很大，战线拉得很长。

张秀山、王兆相率领红军独立师趁隙插入敌后，首战泥河沟，歼灭敌人一个排。之后，红军以弱示敌，派约100多人的独立营，进入敌占区，引诱驻苏怀家守敌出动。敌人果然上钩。敌团长立即率两个营兵力，紧急出动向独立营扑来。张秀山、王兆相率红军独立师主力夜行军60里，在苏泥家村设伏待敌。

拂晓，敌军一个连突然占领村东南山头阵地，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独立师一团，立即发起猛烈反击，全歼该连，俘敌连长及以下官兵几十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手枪几十支。几乎同时，村后山敌人一个连，在行进中被埋伏在那里的红军独立师二团，干净立落全歼俘敌连长。

张秀山、王兆相审讯了被俘的2个敌军连长。一个说：原以为是武器不好的200多人的游击队，想吃掉你们。团长、营长都在后面督战，谁知刚拿下前哨阵地，就被你们冲垮了。另一个敌连长说：“你们红军打仗不正规，不等我们展开，一群娃娃兵上来就把我们抱住了。如果让我们部队占领阵地，看你们能不能打胜。”张秀山听后笑着说：“那就等着以后再碰上时，先通知你们，等你们准备好了再打！”一席话使两个被俘的敌军官苦笑了起来。

为了避免正面作战，根据敌连长供词，张秀山、王兆相率部迅速撤离战场，转移到后方，及时总结对晋军作战经验。战士们认识到，打晋军要勇猛进攻，要出奇不意。

会后，独立师分开作战，一团在王寿梁歼敌百余人，迫使晋军放弃高新庄、衙院沟等据点。二团在万镇山上截击敌运输队，缴获敌军大量米面、驮骡。

红军独立师参谋长李治洲同志回忆说：“秀山同志指挥部队灵活机动，从来不死打硬拼。有一次，秀山率领红军一部外出执行任务，途中突然与国民党军主力驻榆林的八十六师高双城部遭遇。由于敌我力量极为悬殊，敌强我弱，撤退已经来不及了。秀山果断下令，部队立即占领制高点，修筑工事，以强示敌。敌人指挥官不明真相，也命令士兵慌忙修筑工事。在双方相持阶段，秀山急令红军悄悄地迅速撤出阵地，脱离了险地。使红军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转危为安，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各县、区独立营和游击队在保卫家乡的同时，也主动出击，破坏敌人交通，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在根据地军民的有力打击下，敌军两次被迫调整部署，后因傅作义在绥远对日作战而退出苏区。红军趁敌军败退，迅速进至通秦寨一带，打开了佳县金明寺、井道峁、清泉寺等地土围子，解救了大批群众。

12月间，根据情报了解到，高家堡驻有敌人高玉亭营。张秀山、王兆相经与大家商量，决定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吃掉这股敌人。

一天早上，红军独立师派出一部兵力，首先对高家堡南面几十里外乔岔滩村南山碉堡里30余人的民团，围而不打；派出另一部兵力攻打该村一个排的驻守敌军。同时，又派一支小部队到高家堡附近引诱敌军。

战斗打响后，高家堡敌营长高玉亭立即率约两个连的兵力和百余名民团，增援乔岔滩的守敌。红军闻讯后，立即出动两个主力团，在援敌必经之路的黄蒿梁村设好伏击圈。当敌人急速通过该处时，红军战士居高临下，发起猛烈攻击，彻底打垮了敌人。除击毙敌连长一名外，还俘虏了大批敌人，缴获了各种枪支80余支，其他敌人落荒而逃。乔岔滩守敌也被迫投降。

接着，张秀山率部于深夜突然攻打高家堡，红军攻城的枪炮声震天动地，惊醒了全城睡梦中的人们。红军很快歼灭了守敌两个连。敌营长高玉亭侥幸逃脱。红军取胜后，当夜押着俘虏，撤到东南方向几十里外的龙尾峁。

红军在这里召开了军民庆功总结大会，张秀山代表红军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表彰了红军全体指战员和地方支前的民众，号召他们更加努力杀敌立功，争取革命最后胜利。他还宣布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鼓励他们参加革命队伍，而且来去自由。即使释放回家的士兵，也希望他们不要继续与人民为敌。俘虏们深受感动，有的俘虏当即参加了红军。

至此，神府苏区被敌人占领地区大部恢复，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

1937年1月，为扩大革命宣传，筹集军需，张秀山和王兆相率领红军独立师三上哈拉寨，沿途消灭了新民、庙沟门民团，俘虏了先后三次骚扰红军的内蒙骑兵营营长及一批士兵。

从被俘营长韩守信口中，张秀山他们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虽然这个敌营长对事变基本情况说不清楚，但这对远离党中央，通信联络中断，长期受敌人包围的神府特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消息。

为了团结抗战，张秀山和王兆相向这位营长讲解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用酒席款待后，释放了他们。他们开始还不相信红军能放他们回家，可当他们真正踏上返乡之路的时候，都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红军讲信用，够朋友”。韩营长对张秀山等人说，他自己是个大老粗，不懂什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但是自己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再三表示以后不再骚扰红军，拥护汉蒙联合抗日主张。

张秀山和王兆相率领红军避开神木、府谷敌军两个营在门关沟一带的阻击，从府谷城东的温家川、郝家峁附迅速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胜利返回根据地。

1937年1~4月，敌人乘神府苏区与党中央中断联系，未知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的消息之机，以国民党84师师长高桂滋为“剿共”总指挥，纠集七个团、两个骑兵营，近二万兵力，对神府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敌人由佳县、米脂、榆林出发，自南向东压来，企图把神府红军逼到狭小地带消灭。

张秀山根据敌我敌我形势，对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他要求全体红军将士坚持自卫的原则，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坚决消灭来犯的敌人。

红军独立师出兵南进，在当地党组织指引下，进至佳芦县秃尾河畔的薛家会村后山沟里设伏。同时派出一支几十人的小分队，化装成武器差，经验不足的游击队，袭扰附近徐家畔一个营的守敌。敌人看到弱小的红军游击队恼羞成怒，妄图一口吃掉他们。小分队边打边退，一点点把前来追击的敌人，引进红军埋伏圈。红一团奋起攻击，打垮敌人一个连，击毙连长一名，俘敌几十人，缴获枪几十支，其中有轻机枪两挺。

同时，红二团在王家 成功设伏，俘敌副团长以下10多人，枪十几支。

从被俘的副团长苏丁臣口中，张秀山才了解到“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况。同时，还了解到，这次“剿共”总指挥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和前来参加围剿的高双成八十六师矛盾重重。名义上高桂滋是来帮助高双成的，实际上是为了吃掉八十六师。高双成为了保住自己榆林、米脂、横山的生命线，也想借用高桂滋的兵力和与延安停战之机，集中力量消灭神府苏区的红军独立师，以扫清后顾之忧。这些情况，使神府特委进一步了解到了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为红军制定下一步方案提供了有利依据。

1937年2月，中央任命张秀山为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武开章任宣传部长。毛凤翔任统战部长。王宝珊接任神府独立师政委。

张秀山接任神府特委书记后，首先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根据抗日形势，特委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斗争原则，积极主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活动。必须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指出：由于国民党隔断了神府苏区与党中央的联系，特委目前不清楚党中央对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但坚信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本着自卫原则，红军要坚决反击敢于来犯之敌。同时，要写信给周边的国民党军队，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外。张秀山指示红军独立师南下佳县、米脂等敌战区活动，通过敌人的报纸宣传，达到让党中央了解神府苏区情况的目的。

红军独立师出发前，张秀山对王兆相师长说：“兆相同志，我们师深入白区活动，已有好几次，还是有些经验的。这次任务很重要、很艰巨，一定要小心，不可粗心大意，希望这次既能消灭敌人，壮大自己，更重要的是要完成让敌人把我们活动的消息报告给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回来后给你们开庆祝会。

3月，独立师南下，深入敌占区佳县、米脂、榆林一带，纵横几百里。敌人慌忙调集4个团，六七千人马尾随，又派飞机轰炸、扫射，但唯恐中我埋伏，不敢与我交火。敌军被红军牵着鼻子在敌占区转了一阵，搞得精疲力尽。红军冲破层层阻截，胜利归来。很快，闫锡山的报纸惊呼：“共匪人马二、三千人，装备整齐，在佳县、米脂一带猖獗活动，国军正在围歼之中”等等。^①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西安看到报纸上刊载的国民党军队围剿神府苏区红军的消息，立即向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严正抗议，揭露了他们破坏停战协议的行径。敌人被迫停止了对神府苏区的“围剿”。神府特委的战略意图完全实现。

1937年4月，迫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国民党要求与神府特委谈判，在特委书记张秀山的主持下，红军与国民党阎锡山、高桂滋、高双成的各部代表举行谈判。谈判中，他们以为神府红军没有电台，消息闭塞，声称“全国的红军部队蒋委员长都要进行收编”，还对我军干部进行封官许愿。张秀山义正严词地指出：“你到我们这里来想收编我们红军，给我们这些人封了官，许了愿，但你也不看看我们这些人，哪一个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来干革命的。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毛泽东主席要怎样编

^①

制我们的部队，就可以怎样编制。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要调我们的部队到哪里去，就调到那里去。别的不管是什么人，都没有这个权力。我们两家不存在谁收编谁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谈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希望我们今后能精诚合作，团结抗日。”^①一番话说得国民党谈判代表杨鹤龄无言以对，扫兴而归。

张秀山领导神府特委主动积极开展对神府苏区周围的国民党驻军中，中、下层军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前后派王恩惠到佳县通镇与国民党八十四师李少棠团长谈判，派杨和亭到神木县与国民党八十六师罗德新团长谈判；派武开章到佳县与晋军二零九旅段树华旅长谈判。同时，派部队到敌占区散发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宣言，写信给驻府谷的国民党八十六师的高景明营长，呼吁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此期间，神府红军独立师坚决歼灭了敢于抢占苏区几个村庄的国民党八十六师罗德新团的1个连，在他们承认错误后，红军全部归还了被俘人员和枪，既保卫了红色根据地，又向他们展示了红军联合抗战的诚意。

由于敌人封锁神府苏区，特委又没有电台，与中央陆地的通讯联络常常处在中断状态。所以，党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文件，神府特委一直没有看到，这给特委的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为此，张秀山一方面积极派人与中央联系，一方面责成红军及游击队，全国搜集有关西安事变的各种消息。没有多久，游击队就在高家堡至神木的公路上，缴获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王一山给各地专员、县长的一封信。信中详细地解释了西安事变的起因、经过和解决的情况，及张学良、杨虎城抗日救国八项要求，赞扬中国共产党调停西安事变，使之和平解决，及要求全国精诚团结，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这封出自杜斌丞先生之手的信，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对神计特委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团结党外人士参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几十年以后，张秀山仍能记住其中一些片断：

“需知西安事变并非偶然之举，溯至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妥协，实行不抵抗主义；……绥战既起，国人皆日战，而士大夫之流则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张杨二将军披沥肝胆，痛切陈词，不得不发起兵谏之举……”

张秀山结合报纸、情报、俘虏等各方面的信息，依据这封信中的有关内容，

给特委和红军独立师的全体干部，做了一场生动的国内外形势分析报告会，对神府苏区执行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掌握国共谈判尺度上，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经过多次国共双方代表的反复较量，神府特委和红军独立师与周边的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政权，最终达成了停战协议。结束了神府地区长期内战，进入了联合抗日的时期。

对此，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1937年4月3日中央组织部致信神府特委，指出：“你们长久离开省委和中央领导，独立的在神府艰苦奋斗，保卫了神府苏区，扩大了地方武装，最近自动和进攻部队协商停战，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非常愉快，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民族革命的敬礼！”^①

4月底，中共中央派以张邦英为团长、吴溉之为副团长，由王濮、强晓初、李登瀛等领导干部和电台队长、译电员、警卫员等15人组成的中央工作团，通过国民党军队占领区来到神府苏区视察工作。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团肯定了神府苏区的工作。他们认为这里条件虽然艰苦，但工作很扎实，党群基础好，干部情绪高，游击战争打得好，特委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作团向神府苏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新精神，明确了党的工作方针政策和对神府工作的指示。从此，神府根据地不仅能用电台与中央保持联系，还能持介绍信通过国民党占领区往返延安，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也叫苏区代表会）。张秀山要主持神府根据地工作没有参加会议。

在这次会上，张闻天作了《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开幕词。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他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为了一致抗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央决定把苏区改为特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

5月15日，陕甘宁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改

^①